

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汪 刃 锋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终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大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从事民主运动的政治活动家。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我在育才学校绘画组任教。我的住处就在陶先生的卧室外不到三米见方的三角形过道上，和陶先生朝夕相处，对陶先生的情况有些了解。陶先生为教育事业终日奔走劳碌，为民主运动披荆斩棘地进行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至今回忆起来犹如昨日。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于一九三九年在重庆开办的。校址有两处，北碚草坝子古圣寺为校本部，管家巷二十八号为分校。学生都是抗战期间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份的难童，他们原在教养院里，后由陶先生聘请各方面专家帮助挑选而来。这些难童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但都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艺术才能。这些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所需，以及学校教师的生活薪给，都靠陶先生向社会人士劝募解决。所以，陶先生为了向各界民主人士募集办学经费，踏遍山城，不仅奔波劳累，而且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和破坏阻挠，陶先生不得不随时跟国民党特务周旋与斗争。

陶先生的日常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我们育才学校的师生，生活极其艰苦。每天两顿稀饭和一顿干饭，小菜经常是蚕豆煮烂后拌少许盐和辣椒，四川人管它叫“焖豆”。他和师生们吃同样的饭菜，有时早晨出门赶不及吃早饭就吃两个鸡蛋。陶先生穿着十分朴素，他夏天经常穿一套毛蓝制服，春秋穿一套煮的旧学生装，袖口已经磨样起了毛。冬季出门总是穿上他那件还是从美国留学回国时穿的扎原呢旧大衣，脚下总是穿一双旧布鞋。陶先生朴实无华，不修边幅，留着平顶头，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有时，天一清早就来着公文包匆匆走下管家巷分校的台阶，为育才学校的一百多名难童学生的学习和全校师生的生活物资去操劳奔波。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育才学校，是一室民主斗争的堡垒。这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的民主人士、权威学者无不到育才学校来参观访问，有的在校慷慨发表演说，有的为学校筹募相助，所以育才学校里的民主气氛很浓，师生均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此外，育才学校又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来重庆的文学艺术家的荟萃之履。很多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在育才学校教过课作过报告，由于陶先生中很多人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国民党对学术文化事业的摧残，因此他们通过文学艺术形式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开展民主运动，从而使育才学校这一民主斗争的堡垒，基础更加坚实。记得当时在育才学校任课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有任光、艾青、章泠、贺绿汀、沙梅、水华、力群、邹绿芷、张望、王琦、马思聪、黎国荃、李乃忱、徐行、梅德麟、庄言、吴晓邦、盛婕、戴爱莲、许士骐等。

育才学校当时有文学、戏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音乐、绘画六个组。艾青任文学组主任，陈烟桥任绘画组主任，章泯任戏剧组主任，贺绿汀任音乐组主任。当时，育才学校以发扬学校民主、学生民主自治为己任。学校，六个组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职能，运用文学艺术和教育的手段进行斗争，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一九四一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时，重庆笼罩着国民党散布的失败主义气氛，特别是在德军直逼莫斯科城下之时，当时国民党内有些人崇拜希特勒。陶行知先生为了使育才的学生正确地认清国际形势，破除迷雾，并给学生以分析问题、进行辩论的锻炼。他组织育才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国际形势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德苏战争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次辩论开始之前，社会科学组的教师把学生分成两派，分别做准备，找论据。辩论开始了，“站在德国一方”的同学陈述了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的厉害，德国飞机、大炮之多，当时希特勒席卷了欧洲，进而用欧洲的人力、物力来进攻苏联，苏联抵挡不住。站在苏联一边的学生则认为：苏联举国团结，上下一条心，用持久战术终将消灭法西斯德国；而且苏联的抗战是正义的，得到同盟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援助，而德国的侵略行径是不得人心的，德、日、意轴心国已日暮途穷，必失败无疑。所以苏联红军定能保卫莫斯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次大辩论进行得非常热烈，许多来宾听了学生的辩论发言。来宾中有军政界、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葛伯赞夫妇、冯玉祥将军及其夫人李德全女士，重庆北碚区区长卢作孚先生等。这次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使许多来宾大为赞赏，有的即席讲话发表感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冯玉祥将军在学生辩论结束后立即走上讲台。他说：你们这些青少年，在陶校长的天才教育培养下真了不得，你们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形势分析得有将不紊。我在你们这样年纪时，还搞勾勾搭搭一条小辫呢。什么国家大事，一概全不知道，只是觉得自己的苦不苦，挨饿受苦。可是你们今天在座的小朋友，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却敢说出让成年人也说不出来的道理，并且能说出苏联必胜、法西斯德国必败的理论根据。你们真像的德教是不可教也的。

冯玉祥将军讲完话，大家报以热烈掌声。陶校长最后讲了几句词，感谢来宾的鼓励，勉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陶校长的讲话，这次辩论会便圆满结束了。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加紧进攻，企图各个击破。这时一批爱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聚集起来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要求实行宪政，选举政府，贯彻实施人民的民主政治。一天傍晚，各民主党派以及许多民主人士聚集在重庆上清寺张澜的花园里开会。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张澜宣布开会，说明此会的目的是要把战时在陪都重庆的各政治党派、团体和各界联合起来，成为为争取实现民主而斗争的政治联合阵线。当时确定这个阵线的名称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大会当场推选了张澜、章伯钧、陶行知、黄炎培、沈千里、董良、李公朴、方与严、章乃器、胡子婴、罗叔章、马彦祥等人负责，又推选陶行知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管宣传部工作，秘书长由章伯钧担任。大会决定，凡参加会的

都是发起人，还决定办《民主报》，由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负责昆明支部的工作。后来又办了一所社会大学，由陶行知、李公朴担任正、副校长，校址就设在管家巷二十八号育才学校分校内。

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国内的政治斗争也非常激烈。国民党派出了大量的特务暗探跟踪民主人士，干不可告人的勾当。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很风趣地告诉我说，一天他路上饿了，在通辕门里一家卖牛肉汤的小饭铺里吃便宜的牛肉面，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跟踪而来，也走进这家小饭铺，一屁股就坐在了他的旁边，也要了一碗廉价的面吃，陶先生说：“我见此情景，幽默的讥讽这个特务说：‘你太辛苦了，你这份差使是苦差使，跟踪我没有油水呀，只好吃这份廉价的面食了’，那个特务很尴尬，强作笑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跟着你先生硬是不得行，捞不到一点油水呀！’”陶先生说完，爽朗地笑起来，表示了他嘲弄国民党特务的快慰心情。

当时住在管家巷育才分校的李公朴先生，除了担任社会大学的校长之外，还做民盟的组织工作。一天晚饭后，大约八九点钟左右，忽然李公朴先生来找我。他对我说：“刀锋，请你出去陪我走走！”我会意地笑了，说：“你这一大把胡子，一走出门，国民党特务就认出你来了，怎么办？”李先生想了想，诙谐地用围巾把胡子围了起来，说：“你看，现在怎么样？”我说：“你在学列宁的化装是不是？”于是我陪同李先生外出，走访了几处民盟小组。李先生做了一些关于开展当前政治斗争的指示。事后我又陪同李先生回到了管家巷育才学校。

记得是一九四〇年，有一天陶行知校长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向师生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说今天要请周恩来先生来做报告，嘱咐全体师生要认真地听。那天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来到育才学校，向育才和刚成立不久的社会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共四百多人做报告。另外，还有一些向往革命，渴求进步的青年闻讯也赶来聆听。这样一来，把管家巷二十八号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连院子里也站满了人。育才学校的师生，在陶校长事先的严密组织下，从楼上到楼下，从教室到陶先生的卧室门口，都布置了纠察队，以保护周副主席的安全和维持报告会会场的秩序。会场虽然也混进了一些国民党特务，但由于有了陶先生的周密安排，使他们没法搞破坏。

周恩来副主席一走进会场，群众便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周副主席开始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他说，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有些好心肠的人都很着急，我可以告慰诸位的，是大家急不得，急躁行事就要出毛病，我们中国当前正象是在悬崖峭壁上行驶的汽车一样，要耐心，要警惕，要慢慢地行驶。急不得，一着急，在这危险的路上就要出岔子。因此，我们主张国共两党谈判协商，团结合作，坚决打击投降分裂活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

周副主席的这个报告，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讲到天黑。育才学校的楼上楼下以及院子里都打开了电灯，灯火辉煌，一片通明。周副主席讲话长达四、五个小时，但他却毫无倦意，越讲情绪越激昂，精力越充沛。大家听了心情非常振奋，深受教育和鼓舞。周副主席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给重庆市各界爱国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周副主席报告结束后，大家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送他离去。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全国闻名的文化界进步人士郭沫若、茅盾、老舍、陶行知、沈钧儒、柳亚子、冯雪峰、马寅初、徐悲鸿等人发表了有三百多人签名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陶先生是《进言》的发起人之一，他同时推动了育才学校不少同志签了名，记得育才学校在《进言》上签名的有：教务主任方与严，文学组的诗人力扬、邹绿芷，绘画组的许士骥、刃锋、王琦，戏剧组的刘厚生、舞蹈组的戴爱莲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来，全重庆市都沸腾起来了，群情振奋，无不欢欣鼓舞。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内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峻和复杂的。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几十万嫡系部队，并拉拢和收编伪军，阴谋准备进攻各个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民盟委托陶行知先生发起召集了有民盟、共产党代表、各界知名民主人士、左派教授和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在陶先生宿舍里举行，由陶先生亲自主持。到会的人我到现在还记得的有：沈钧儒、李公朴、章伯钧、章乃器、阎宝航、史良、胡子婴、罗叔章、曹瑞华、郭沫若、侯外庐、邓初民、翦伯赞、胡绳、方与严、马兆民等。

座谈会上，首先由共产党代表（姓名忘记）分析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他指出在日本侵略军的装备和部署有三种级别：日本关东军是甲级配备，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华北占领军是乙级配备，主要是为了对付我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的；华中日军是丙级配备，这才是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当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加快受降步伐，加快夺取城市，甚至命令日军不要放下武器，和他们一起反共。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时间就是胜利。我们共产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决议，派出了一万名干部，连夜奔赴东北，兵分两路：一路从华北出发，另一路是海路，从山东半岛渡过胶州湾去东北。我们要接收日本关东军的甲级配备来武装自己，统一华北、统一华中，一直到解放全中国。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决策和宏伟的部署，希望得到各位朋友和各位同志的政治上的配合，我们要和国民党做坚决的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

共产党的代表发言之后，历史学家翦伯赞发言。他说：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我国三千年以来，历来都是由北而南地统一中国，只有明太祖朱元璋是由南而北地建立大明王朝的。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英明决策之下，由北而南地统一中国，是当今历史的必然。

陶先生出面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对于统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认识，明确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前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了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改组国民党政府等五项议案。这一喜讯激动了山城重庆。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联合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准备隆重庆祝这一民主斗争的胜利，我代表木刻界参加了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担任筹备委员。

庆祝会的筹备工作紧张地进行，在一次由沈钧儒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大家经过热烈的讨论做出了扩大庆祝的决议。筹委会委托我制做在重庆校场口举行的庆祝大会的设计图。我立即设计了一张大会会场图，还为会场主席台设计了一幅象征人民争取民主胜利的会标。图案的中央是一个朱红色的“V”字，一支金箭横穿在“V”字上。主席台设在校场

口大圆盘的中央，不到两米高，台前挂着横幅和那象征着人民胜利的“V”字形标记，主席台布置得很庄重。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清晨，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带领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几名同学，赶往校场口会场去布置主席台。临出校门时碰到了陶校长。陶先生对我们说，要提高警惕，预防国民党派特务捣乱和破坏，叮嘱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保证把会场布置好。陶校长还特意组织育才学校戏剧组和绘画组年纪较大的男同学去会场担任纠察队员，维持会场秩序。

我们到了校场口会场，在主席台上的“V”字形标记两侧布置上两面国旗，台上放了3张育才学校上课用的条桌，铺上白布单，还放上一瓶花。主席台前挂的是红底白字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横幅。我们把会场主席台全部布置完毕后，时间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这时主席团的成员陆续到来，我记得走上主席台的有郭沫若、李公朴、沈钧儒、阎宝航、施复亮、胡厥文、章乃器、陶行知、方与严等。九点半钟，司仪宣布开会，奏《义勇军进行曲》。这时校场口已经人山人海了。

就在大会刚刚礼成的时候，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方治派来的一帮特务打手，横冲直撞，爬上主席台，劫持了会场。他们挂上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先生像，还带来了乐队，在台上奏起了三民主义的国歌，叫嚷着要人们唱国歌，行鞠躬礼等等。这时台下的国民党特务也同时骚动起来。台上有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似乎是个特务头目，他跟我对视了半晌，仿佛发现我不是他要找的对象，于是就冲施复亮奔去，把施复亮往台下推。施复亮大声怒斥暴徒说：“你们这些暴徒简直是法西斯，你们是一群打手，是一帮骗子，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宪政？”台上闹得越来越乱，暴徒们毫无顾忌，喊打连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公朴被打伤了。郭沫若也被轰下了台。郭老丢失了眼镜，正在寻找眼镜时，一个特务打手冲过去要打郭老。这时有人喊道“他是政协代表，打不得！”国民党的警察听说郭老是个“官”怕打伤了他不好交代，立即拥上来，把郭老护送出重围。

国民党雇佣的特务打手和到会的工人、学生发生了冲突，在搏斗中，许多特务打手被工人、学生击败，弄得很狼狈，有的被当场捉住，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发给他们每人充当打手领取五千元的纸条。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校场口事件发生后，我们立即将受伤的李公朴先生送进重庆市第二医院。他的头撞受了伤，治疗后头上扎上了绷带。李先生的精神还很好，他躺在病床上让我给他画速写像，我给他画了一张。李先生诙谐地对我说：“这很有纪念意义。”

校场口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大公报》等纷纷报道校场口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特务暴徒的罪恶行径，撕破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丑恶面目。

校场口事件发生后，陪都各界民主促进会秘书处立即发出通知，召开了紧急会议，选出四位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面见蒋介石，严惩凶手，保障人身安全。第二天又在重庆大梁子“星五聚餐会”召开有国共两党代表团出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各界代表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重庆谈判、政协决议，制造校场口流血事件的卑鄙行径。代表美术界在会上发言的有倪貽德、叶浅予，还有我。各界代表在讲话中一致要求严惩校场口事件的唆使者和肇事行凶的罪魁祸首。

这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开得声势浩大，正义凛然，苏联、英、美以及当时民主阵营的其他国家报纸都报道了校场口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陶行知校长是校场口庆祝大会的组织者，他为这次民主斗争贡献了不少力量。在重庆的各次民主斗争中，陶校长总是注意发动育才学校的师生投入到运动中去，使大家受锻炼，并做出贡献。在校场口事件中，育才学校的学生奋力保护了一些与会代表突出重围，使他们未受伤害。陶先生还运用他的影响，多方联系，约请许多民主人士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及时报道了校场口事件的真相。

当时陶先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重庆支部的主任委员。他聘请邓初民、胡绳主编《民主周刊》，委托马兆民主编民盟的机关报《民主报》。这两份报刊，在当时的民主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为争取民主，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一天晚上，陶先生约我出去，我们拐到通远门内一家小铺子里，陶先生已经约好一位朋友在这里喝牛尾汤。陶先生要了一大盆牛尾汤，还有几样小菜，我们三人一同吃起来。那位客人很健谈，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他加重了语气对陶先生说：“您可以用您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争取您的国外朋友和有国际威望的民主人士，支持我国当前的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发动内战，争取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实现联合政府。”陶行知先生不仅在南洋众多的华侨中有影响，在美国亦有威望。陶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位客人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群众》月刊的主编于怀（乔冠华）先生。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与此同时，蒋对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两位伟大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时候，重庆的天空也是乌云滚滚，重庆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随时有陷入国民党魔掌的危险。这时陶行知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仍旧勇往直前地为民主事业奋斗。

一天，陶行知先生一清早走出大门，直到天黑以后才回来。他踏着沉重而疲乏的步子一步一步地攀上楼梯。他路过我床前叮嘱我说：“汪先生，我进屋睡一会觉，等夜里十二点后请你进屋叫派我，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给办一办。”我点头答应。不久，就听到陶先生在屋里打起鼾声。

这夜前半宿，我没敢入睡，生怕耽误了陶先生的事。夜十二点一到，我便去敲陶先生卧室的门：“老夫子，老夫子！”（我们都尊称陶先生为“老夫子”。）陶先生醒了，打开卧室的门，我进屋坐在一张椅子上。这时老夫子还有些倦意，躺在床上，枕头垫得很高。陶先生说：“对不起，汪先生，我就不下床了，我口述，请你给我记一份材料。”我找来纸和笔，陶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想了想，对我说：“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吧！”

我替陶先生记述的内容现回忆如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世界人权保障同盟

杜威博士：

您是一位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民主和自由的保卫者。希望通过您，通过您的国际威望和影响，伸出友谊的手来，有力地支援我们民主党派和为民主与自由献身的战士，以抵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世界上最残忍、最野蛮的法西斯暴力，它企图使中国人民永远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觉醒了的人民，坚决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使中国也能象二百年前的美国那样，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把民主、民治、民享的权利归还给人民，使和平、民主与自由永远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

杜威博士！过去我曾聆听过您的教益，今天我作为您亲密的朋友，我愿把我的祖国从黑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同时把我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充分民主自由的国家，把当前统治中国的法西斯细菌永远消灭。做为您的亲密的朋友，希望通过您，用您的威望和影响，使美国政府制裁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迫使他使受人使的愿望，使我国实现联合政府的原则，从而走向和平民主新的未来；如能这样，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您的亲密的朋友陶行知

我记录完毕，又给陶先生重使了一遍，陶先生听后作了修改，然后签了名，让我送到《民主报》社用电报发出去。

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走的道路同鲁迅、邹韬奋等革命先驱者一样，他们在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道路上洒下了汗水，留下了足迹。陶行知先生虽然早已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民主而战的光辉事迹，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北京

（上15接页）

海照将庙产、文物、法器移交后，即结束了拈花寺的住持工作，后被介绍到育婴堂街小学做职工。

解放后，随着首都建设事业的发展，拈花禅寺一带的西貌也日益改观，昔日的窑坑处修成了美丽的龙潭湖。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失业大军，挖掘窑坑、修建人工湖。龙潭湖园林，北自五里坨，西至火桥（旧称霍家桥）；南、东至城根，占地两千三十亩，修的东、中、西三个人工湖，水面积共七百七十七亩。沿湖辟有多处绿地，广植落槿、落乔、松树、果树、绿篱。这里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绿荫葳翠，亭台巍峨；泛舟、垂钓、散步使身者竟日不绝。这新兴的西林较昔日冯溥的万柳堂不知胜过多少倍了。

天桥艺人轶事

高凤山 陈德光

北京的天桥，驰名中外，它以独特的风趣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早年，每天来逛天桥的人川流不息，人们在这里尽情地娱乐：听评书，听大戏，看变戏法的，看打把式演杂技的，真是样样俱全，目不暇接。天桥，是艺人的一口饭锅，它养育着千百艺人和他们众多的家小。天桥，是艺人成材的基地，过去许多著名艺人，都是自幼在天桥锻炼出来的。过去有何俗语：“天桥是作坊，天津是门市”，意思是说艺人从天桥锻炼出来，要将其技艺奉献到天津的观众眼前，得到承认才行。可见过去的京津两地的艺人与天桥这个源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入日寇魔手。天桥失去了早年的繁荣景象，一天天冷落下来。歌舞台、燕舞台火焚后无复修期，众多的小戏棚子卖不上座了，坤书馆里的听客也寥寥无几，摆地的艺人也打不上钱来，许多艺人都因此失业了。天桥有名的“八大怪”之一“大金牙”（焦金池）的徒弟罗沛霖，尽管每天将他那拉洋片的锣鼓点敲得山响，也叫不上座来；他光靠在天桥卖艺无法谋生，被迫每天下午去“串巷”（艺人到戏院表演叫“串巷”）。天桥的艺人还在政治上惨遭日伪迫害，精神上备受折磨，更是苦不堪言。这里记述几则天桥艺人当时的轶事，以见他们痛楚生活之一斑。

杨庄奋夺日特手枪

杨庄，俗称杨撞，是在天桥摆地唱数来宝的一名艺人。他的演出场子在小桃园剧场的前面。杨庄当年不足30岁，中等身材，长面脸，体格健壮，性格粗鲁，有正义感。1938年夏，日伪在北平的反动统治愈加残暴，市面萧条，人民生活艰难。杨庄对日伪的残暴统治早就不满，加以在天桥卖艺挣不来钱糊口，心情更加愤愤不平。一天，他上完了早场，看到小桃园剧场西把角的“新民茶社”（日伪组织的一个俱乐部，内有茶座，出入者除日伪的警、宪、特务外，还有投靠日伪的少许艺人）门前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杨想靠近门扉看看究竟，正巧赶上两名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走出门来，其中一人气势汹汹地用手一推杨庄的前胸，险些将杨推倒，并用日语吼了几句，意思是让杨给他们让路。杨庄此时并未挡路，却无故被推搡辱骂，不由得怒满胸膛。他顺手揪住一个日本人的衣领，抬腿踢了一脚，再撒手一推，给那日本人摔了个嘴啃地。另一个日本人见同伴被杨踢倒，马上从腰间拔出手枪。未等枪响，杨庄早已手疾眼快地将枪夺了过来，甩臂一扔，把枪扔到小桃园剧场的铅板棚房上去了。被摔倒的日本人从地上爬起，也从腰间掏出手枪，杨庄同样夺过扔到房上。这两个日本便衣见抵挡不过杨庄，便一人与杨庄周旋，另一人匆匆跑进“新民茶社”挂电

话，喊来宪兵、警察。杨庄当即被日伪警宪上了绑，带往东珠市口路北日本宪兵队。后来，杨庄虽被日寇杀害了，却博得了天桥艺人们的称赞，说他不愧是一名有骨气的中国人。

张宝忠被宪兵队拷打致残

张宝忠，天桥的武术艺人兼摔跤手。张宝忠的武艺是祖辈家传的。其父张玉山，也是天桥艺人，以打飞弹驰名。板凳上放只茶碗，在碗沿上放一被铜钱，上放一个小泥弹，张玉山在几步之外拉弓射一泥弹，以弹打弹，可将碗足上放的泥弹打碎，茶碗毫无损伤。张玉山还能用飞弹打灭悬挂在空中的香柱火头，只格火头打灭，香柱不断，此艺堪称一绝。张宝忠从父学艺并苦心钻研，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技艺，还学会了刀、枪、剑、戟等多种武艺，后又学会了摔跤。张宝忠由于有武术功底，腰腿功夫硬，他的摔跤属“把式跤”，在天桥跤手中是佼佼者。他的卖艺场地就在丹桂戏园后身，南来顺饭馆南。七七事变后，张宝忠的遭遇与天桥众多艺人一样，也是生意日益不振，难以养家糊口。

1940年春末夏初，有一天张宝忠的盟弟李福林来找张借钱（李福林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张宝忠知道盟弟又是没钱去白面房子过瘾了，遂力劝李福林戒掉吸毒嗜好，改邪归正。不料，李福林恼羞成怒，扬长而去。后来李福林在白面房子里面事被逮入日本宪兵队后，不堪重刑拷打，竟诬陷盟兄张宝忠私通八路军，为解放区贩运火柴、食盐、医疗用品。因此，张宝忠当晚在天桥下地演出后就被逮入东珠市口日本宪兵队。家里的妻儿老小晚上见张宝忠没有回家，经多方打听寻找，才知道他已被关进了宪兵队，但又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在天桥打把式卖艺的人能有什么罪呢？

张宝忠在宪兵队里受尽了毒刑拷打，日寇用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逼张宝忠说出私通八路军的事，张宝忠始终不承认有罪。后来曲曾在天桥唱过河南坠子的姚俊英之兄热心助力，才使张宝忠得救。张宝忠在日本宪兵队里关押了数月之久，出来时已遍体鳞伤，耳朵也因灌凉水和拷打致聋，成了终身残疾。

孙傻子跤摔牛岛大佐

牛岛是日军的一个大佐，并充任天桥“新民茶社”的负责人。此人中等身材，体胖肩宽，一脸连鬓胡子，一副凶神恶煞模样。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酷爱中国武术，经常着便服来天桥跤场看摔跤演出。

1940年间的一天，牛岛由两个日本兵陪同又来天桥跤场。当天跤场上正由宝善林（宝三）、满宝珍、孙傻子等名跤手轮流攒跤。牛岛看得上了瘾，有意要以日本的跤艺压倒天桥跤场上的众跤手，遂让两名日本兵脱掉上衣，换上坎肩，系上裤带，前后上场对跤。宝善林等人见势不妙，怕惹是非，连连施礼谢绝。但牛岛执意不肯罢休，非要天桥的跤手跟他带来的随从比个高低。宝善林跟满宝珍商议，说：“看这架式不摔躲不过去了，再跟他面

子，他仗势欺人，要把场子砸了，咱们大伙也就全完了。摔就摔吧！”满宝珍一横心，一个鱼跃步来到中场，一连摔输了牛岛带来的两名随从。牛岛大为恼火，他甩掉便服，露出光膀，系上褡裢，要亲自与天桥的跤手一决胜负。满宝珍见状，觉得“祸”是闯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摔牛岛三跤，也杀杀他的傲气。正当满宝珍探身要与牛岛搂腰较量之际，孙傻子箭步跑出，用力将满宝珍往场外一推，并示意让满宝珍躲开，免得祸事临头。孙傻子决意要替满宝珍跟牛岛决个胜负高低。他想：满宝珍的跤术再好，前已连胜了两人，体力消耗太大，再摔牛岛，恐怕气力难支。再说，牛岛亲自上场，定要拼命替输跤的随从扳回面子，难免急了使鬼，恐怕满宝珍要遭牛岛暗算。

孙傻子（艺名），原在绗鞋作坊耍手艺，业余爱好摔跤，后在天桥下海卖艺，是一位名跤手。孙的体格健壮，窄脸膛，后脑勺突出，长得有些傻样，故艺名“孙傻子”。其实，他聪敏机智，为人朴实善良，是人们喜爱的一名跤手。

果然不出孙傻子所料，牛岛气急败坏地上场，赢跤心切，企图以力猛取胜，但他的体格太胖，动作欠灵活，加以孙傻子有过硬的腰腿功夫，没有几个回合，牛岛就先失了一跤。孙傻子在后两跤中有意让了牛岛一跤，这样即以三跤两胜战败了牛岛，又给了牛岛一个小小的面子。

牛岛输跤后，对天桥跤手的跤艺不得不心悦诚服。中国摔跤讲求腰腿上的真功夫，并注重摔跤道德，不伤害人身，不致对手于死地，落地为输，胜负事小，切磋跤艺，以武会友为重。天桥跤手的这种作风使牛岛有所感悟。输跤后，牛岛曾执意要请天桥跤场上十几名跤手下馆子吃饭，并跟跤手们照了一张合影像。

外地演出提心吊胆

抗战期间，我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寇侵略。解放区的人民配合八路军抗日部队，经常出没在铁路公路沿线，锯电线杆、剪电线、扒铁路、挖沟壑，阻隔和破坏日寇军需运输和通讯联系。因此，日本侵略者大为头疼，遂沿铁路线强迫老百姓组成“爱护村”，妄图用这种办法保护铁路公路的畅通。

1940年前后，北平日伪一个名叫“爱路科”的组织，发起招募天桥艺人组成演出队，到平汉铁路沿线各地“爱护村”，进行宣传演出。“爱路科”依仗日伪权势，找到天桥相声演员侯一尘，令其组班邀角，言明参加者按日计酬，每天付包银一元五角，以包银邀角是假，强迫去搞宣传是实。被拉上的艺人不去也将去，不去输出队，弄不好也许进宪兵队。结果，唱数来宝的王凤山、高凤山，变戏法的范香和，唱京韵大鼓的杨寿山等十余人参加了演出队。

这支演出队曾在安辛、万城、固安、保定、白洋淀等地停留。当时，沿铁路线的公路上，三步一沟，五步一壑，沟壑均深达1米，宽有2尺，汽车难以通过。再看那铁路线上的电线杆子，被锯倒后扔得横七竖八，间或在未锯倒的电线杆上还看得见吊着的尸体，显然这是被日寇残害的乡村百姓。日寇尽管如此残暴，但却色厉内荏，非常心虚。他们下乡

不敢穿军装，都用羊肚手巾包头，换着中式袄裤，冒充中国老百姓，怕穿日本军服碰上八路军丧了命。这支演出队就由这样装束的日本人带领，另有几名荷枪的伪军护卫，艺人们走路时犹如被押的犯人一般。

演出队每至一村，就在村头空场演出，日寇让艺人们演唱有关爱护铁路内容的曲艺，但艺人们谁也不会演唱这类段子，只好勉强敷衍几句了事。每处看演出的人都不多，村里的青壮年没人来，只是些小孩、老头、老太太被强迫出村来“捧场”。演出后有人出来讲话，宣传应如何如何爱护铁路，讲话的汉奸狗腿子也很胆战心惊，唯恐话还没讲完，八路军的枪声就响了，所以都是匆匆应付两句就收场。讲完话，日寇让人拿出带来的糖果饼干往地上一洒，想让孩子们拣着吃，借以增强人们的印象，提高宣传效果。但是乡村的老百姓都把孩子的衣襟拉得紧紧的，孩子们也都惊恐地瞪着日寇，并不去捡敌人洒下的糖果。每场演出宣传就是这样自讨没趣地收场。

有一次，演出队来到宝坻县伪县政府大院搭台演唱时，艺人高凤山趁自己的节目还没上场，到外边溜达，在门口见到一个老乡打扮的人随观众走来。此人对高凤山低声说：“小伙子，看样子你是刚来的演出队的演员吧？快跑吧，别演啦！”说着，此人一撩衣襟，露出了腰间插的一把弯把盒子枪。高凤山见状，脸刷地吓白了，心想：“这人兴许是抗日游击队员吧？可能要有一场真刀真枪的‘武戏’在后头，我不能拿命当儿戏，挣不了两壶醋钱，反而把命搭上，还是跑为上策。”高凤山感谢这个人给自己指明了生路，马上回奔后台，佯装肚子疼得厉害，说得了急性痢疾，节目不能演了，借机逃出，与演出队不辞而别。后又辗转回到北平，再也不干这提心吊胆的演出队的营生了。

艺人改行也难糊口

天桥本是北京的中下层市民的游逛之地，上层富豪人士偶尔涉足，不过是为了猎奇。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市，百业不振，民不聊生；不要说一般贫民百姓衣暖肚饱不可及，无钱游逛天桥，就是殷实富有者，难免受日伪的敲诈勒索，也没有闲情逸致到天桥去游逛了。所以，偌大的一片天桥游乐场所，人影稀疏，毫无生气。艺人们靠卖艺难以糊口，纷纷转业另谋生路。

当时，在丹桂剧场有个唱河北梆子的老生演员，名叫杨殿元，已年过半百，因在圈子分不到份金，一家老小无法过活，被迫改行，挎篮下街叫卖花生、山里红。程文祥是在天桥撂地变戏法的一名艺人，原籍是号称杂技之乡的河北吴桥。其父程半仙早年就在天桥变戏法卖艺，驯熊是他的擅长，且有板凳面上的硬功夫，诸如顶碗等技艺。程文祥继承父业，靠家传的技艺在天桥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但此时他的收入也不行了，不得不改行，就在天桥摆摊卖盐。单琴大鼓名演员关学增，早年曾与陈士通同在天桥唱单琴大鼓，此时也改行串街去卖臭豆腐了。天桥“八大怪”之一、彩唱数来宝演员曹德魁之徒高凤山，在天桥撂地演出也挣不来钱，被迫改行去火车站拉排子车。艺人们尽管用心良苦地改操他业，也是难得温饱。

更悲惨的是被骗或“自愿”卖身去做劳工，以致死在异乡，尸骨难收。当时天桥有个

唱数来宝的艺人名叫雷雨田，也是曹德魁之徒，卖身做劳工，到了关外，惨死在异乡。天桥名跤手沈三之徒李德林，艺名叫小李三，被抓劳工的抓走，下落不明。当时传说，抓到的劳工不是被押送到关外，就是给诱骗到大同、阳泉一带的煤矿上为日伪开矿采煤。李德林究竟流落何方，实难查询了。

纵有全身艺，难逃饿死鬼

北平沦陷期间，天桥有些有硬功夫、练武术杂技的艺人，也因生意不振、吃不饱饭而活活饿死。

七七事变前，天桥有个演砸石头的艺人，艺名叫傻二愣子。此人撂地演出，由其父亲掌锤。因砸石头这玩艺儿在天桥只他一份，他的功夫又好，表演惊险，所以闻名一时，很能赚钱。傻二愣子家住西直门，每天来天桥演出前，要随其父去西直门外拣石头。爷儿俩拣的石头，大块的约重十来斤，小块的也有五六斤重。每天约拣二十来块，放入帆布袋中，背来场地。爷儿俩还经常到各处砸房去拣废弃的磨盘，并到街巷拾拣弃置的房基条石，供表演大型节目“排肋”、“油锤贯顶”等用。表演砸石头，需要健壮的体格，而且要有气功。傻二愣子是个童男子，体格棒，吃得多，每天得吃一斤半牛肉，否则难以支撑一天的演出。傻二愣子长得膀大腰粗，胳膊赛过棒锤。他表演大型节目“撑印”时，裸赤前胸仰卧在两条板凳上，请四五位观众将一块二百多斤重的磨盘压在胸上，由其父掌锤砸下，一锤就将磨盘击碎，而傻二愣子胸肚的皮肉毫无损伤，且面不变色，神态如常。这类惊险的大型节目演出时很受欢迎。七七事变后，天桥的游人越来越少，傻二愣子爷儿俩的生意也渐渐冷落，赚不着钱，吃不饱，其父先行故去。剩下傻二愣子一人，大型节目演不了了，只好演些砸石子的小节目，但也不能混饱肚皮。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来，终于在1942年前后沦为饿死“鬼”。

又，天桥名跤手张狗子（艺名），此人长得身高体胖，大肚皮鼓鼓的，经常裸露，像是一尊大肚子弥勒佛。张狗子的住家在崇文门外南岗子。他原为脚行中人，年青时酷好摔跤，后下海在天桥卖艺。张狗子早年干脚行拉排子车时，能与两名同伴（自己驾辕，两人拉纤）拉运三吨半重的大纸；一包百多斤重的大米，他用胶下挟走毫不费力。体魄这样健壮的胶平怎能吃的少呢？早年北平市面上卖的“锅饼”，一个不下六七斤重，张狗子一天就得吃掉一个。七七事变后，很多天桥的艺人都不胜悯叹地跟张狗子说过：“这年头儿，我们都混不饱肚子，老张你这大肚量就更甭提了，迟早咱们要饿死，你可能是打头儿的！”果然，张狗子的太肚皮一天天瘪下去，大胖子变成了小胖子，小胖子变得皮包了骨。他在抗战胜利前已是奄奄一息了。

清万柳堂变迁记

陈德光 赵润田

北京的万柳堂有二：一是今广安门外有个万柳堂，是元代廉希宪的别业，早已无存。一是清代的万柳堂又名亦园，坐落在崇文门外东南隅，为清初冯溥的别墅。本文记述的为清万柳堂。这片园林曾以它绕有特色的风景驰名京华、各地名儒来京常在这里宴集。

万柳堂远离京都闹市，其地原是一片水洼荒野，很少有人涉足。这荒僻的地方，清初被文华殿大学士冯溥看中了。冯溥为顺治进士，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清王朝的重臣。冯溥从政之余，想有个幽雅的休憩之所怡养身心，遂买了这片空地，派工匠治园垒山，挖池植柳，建成了万柳堂园林。据《宸垣识略》中“识余”一则载：冯益都（即冯溥）万柳堂始创时，堤上募人植柳，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李笠翁句云：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犹黄鹄，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醴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盖纪其实也。

万柳堂园景很有特色，整个园林占地一顷有余，四周围矮墙，园中植柳万株，故名万柳堂。园林中建楹五间，厅室敞亮雅洁，冯氏用以待客宴饮。园内培有土山，山上建一小亭，环山挖有曲池，池通桥，内养鱼种荷，名藕花屿。沿山路攀缘而上，可小憩亭间。极目远眺野景尽入眼帘。那碧水与粉荷相映，野花与菌草为伴；郁郁葱葱的万株柳树，遮天盖地，浓荫茂密；枝上的蝉儿竞相长鸣，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这片园林的声色。

万柳堂由于景色美好，清初时各地来京的仕儒常到这里雅集。康熙朝初，清兵刚刚入关不久，清王朝国业初奠，康熙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用武力继续向江南推进，镇压南方的抗清力量；另一方面，则极力用收买手段网罗声望较高的明代儒士，用其为清王朝效力。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设博学鸿词科，被录取者俱授翰林院职。因此，各地儒士多聚于京师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爱才如命，好吸引士类”，常常在聚特报名士来万柳堂宴集，流觞修禊，吟诗畅怀。

康熙间名士到过万柳堂的，有翰林院编修，累任皇帝侍读的进士乔莱（石林），有毛奇龄（西河），他是明季康生，以文享名，清顺治时避仇改名王彦，以后毛奇龄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有朱彝尊（竹垞），康熙十八年朱五十以布衣徵治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精考据，工诗文，参加过纂修明史工作。有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过纂修明史的陈维崧（其年），还有徐乾学、杭世骏等人。上述诸人，无论从学识、名望，还是从君宠、地位来说，都可称是当时的一流名士，这些风云人物涉足万柳堂，遂使万柳堂成为骚雅之地，因此名声更为大振。

名儒喜爱万柳堂，他们在这里游览风光，交觥酬唱，留下了许多诗文。毛奇龄、乔莱为万柳堂作赋，陈维崧作序；朱彝尊为万柳堂作记；高念东也作亦园记；至于一些名儒

与万柳堂东道主冯溥的唱和诗作就更多了。这些诗文记述了万柳堂的由来，描绘了这里的风光，朱彝尊还将在万柳堂宴集比作晋永和九年五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有人进而为文称道万柳堂的创业者冯溥，说他“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宣扬冯溥礼贤下士，好结交诗友，仗义疏财。这种文字恰与当时朝廷的招抚政策一脉相承。互相呼应，颇有政治意味。

康熙中，冯溥将万柳堂让给了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1702)，有人想从石文桂手中得此园林，石文桂便召工在万柳堂建了大悲阁，据说大悲阁一夕而成，石文桂遂以家祠谢贵人，才保住了这片园林。石氏这个家祠后舍僧人德元住持，名曰拈花寺。康熙帝御书“拈花禅寺”额赠德元，额悬大悲阁。

此后，万柳堂日益荒芜，乾隆初年已更加败落，往日的风姿美景再也看不到了，而是“柳枯水涸”“桥断亭倾”，一派萧条冷漠。拈花禅寺也多破损，古佛卧阶，墙垣断墙，景况也很凄凉。励万宗的《京城古迹考》不胜感慨地记述道：“今其基周一顷余，内有小土山，枯苇蓬蓬，生沟塹中，想即昔时莲塘花屿也”。

清亡后，民国期间拈花禅寺更加冷落。这期间，拈花禅寺住持僧相继有诚安、然惠、禅林、海照等人。

诚安，本地人，俗姓张，家住拈花禅寺迤北小龙王庙(属板厂火神庙)后身。诚安的父亲以贩卖劈柴为业，会做活手艺，有时收购到整齐的枣木，就做些木榔头拿到花市集去卖。诚安家境贫苦，故被舍庙为僧。

诚安死后，拈花禅寺住持由然惠接替，然惠僧初在通县，为稿村某庙方丈，来京后先在安化寺，后住持拈花禅寺。然惠之后，由禅林及海照相继住持拈花禅寺。

海照亦名果然，俗姓肖，原名肖顺巨，湖南省邵阳县大东乡肖家湾人，生于1902年，七岁丧母，十六岁出家为僧，出家前学过米匠。海照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在安徽省安庆迎法寺、上海玉佛寺、浙江省天台山日清寺等庙内为僧，1939年一月来北京。海照来京先在法源寺，又转广济寺，后经广济寺显宗和尚介绍，于1945年来拈花禅寺为住持僧。

海照住持拈花禅寺期间，拈花禅寺尚有土地一顷八亩(包括庙基地及万柳堂园林废墟等)房一百八间(包括庙外房屋)。拈花禅寺庙基计1019.9平米，庙内总建筑面积1198.7平米(因庙内有两幢阁楼，故建筑面积比房基面积多)，庙内空地(包括院墙)为1862.1平米，折合土地为四亩三分二厘。

拈花禅寺有前、中、后三层殿及御书楼一座。前殿为弥勒殿，瓦顶，门窗皆为木隔扇。中殿是关帝殿，瓦顶，门窗也都是木隔扇。后殿为大悲阁，是中式阁楼，两层，门窗亦为木隔扇；两层楼均有廊，廊约一米多宽，二楼廊前有木制的栏杆。此阁楼的山墙、后檐墙及顶均用砖瓦砌盖，因年久怕梁柱腐朽而墙壁倒塌，本世纪四十年代时其外墙皮上已打了铁钉子。

御书楼在大悲阁东，与大悲阁并排相连，但以东厢房为界，把两座阁楼分在东、西两个院内。御书楼的建筑格局及用料与大悲阁相同。因楼内墙壁上嵌有康熙御书碑刻十五块，故称“御书楼”。御书楼内悬有康熙写的“简廉堂”额。楹柱上有联，文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康熙题额“简廉”，有意颂扬时政，勉慰儒仕；但这御书楼实际上却成了文人骚客凭栏观赏万柳堂风景的场所。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拈花禅寺内尚有房57间，院落五处。这五处院落即：三座大最前的三层院落；御书楼所在的东院；另一院落在大悲阁西，为西跨院，实际是块空地。拈花禅寺的山门为南向，久闭不启，另有东旁门三座，西旁门一座。东院的围墙早已倒塌，所以东面的三座旁门早就没有了。西旁门在弥勒殿西，因大悲阁、关帝殿、弥勒殿另有厢房或围墙连接，且这些围墙较为完整，所以出入这些大殿和院落需走西旁门。西旁门外有农田一块，出西旁门经农田小径约走三十米才到大道。

拈花禅寺原为石文桂的家祠，这一家庙性质保持较久，故到海照僧住持此寺时，他也不外应佛事，寺内也不设灵房停灵。因此，寺内开销主要靠出租寺产维持。一是寺旁有些土地可耕，辟成了菜园，租给佃农名叫石海的种菜。二是靠近城根的寺产土地数十亩，租给了名叫韩子华的管理，韩把这片土地辟成了葡萄园，培育葡萄出售，他每年给拈花禅寺交地租四千斤玉米。三是有些房屋租给居民住用。还有人租用寺产开粉房，磨制绿豆粉条。有人垒池蓄水开了纸房抄晒豆纸。粉房用豆渣养猪，猪圈的臭味熏天，纸房用烂纸泡纸浆，臭味也很难闻，这给残破不堪的古寺增加了污秽。

解放前，拈花禅寺周围的环境也日益污浊，其西面、东南一带，有吕家窑、内潘家窑，外潘家窑等窑坑多处，从龙须沟流下来的污水，都汇集在这些成片的窑坑里。盛夏，烈日晒得坑水冒泡，臭气难闻，令人作呕。在这些窑坑里，不仅漂有死猪烂狗，寻短鬼溺死者的腐尸也不鲜见。在这些窑坑岸边和荒野上，坟墓比比，尸骨裸露地表，更难目睹。

北京解放后，拈花禅寺的部分大殿和厢房供办了学校。1949年9月，建国小学迁来开课。建国小学原在左安门内，校舍系租用私人房屋，该校原系解放前伪北平十区二十保为蒋介石六十寿庆献办，负责人名马志荣，马当时为经纬织布厂经理，曾任二十保保长。解放后，该校迁来拈花禅寺庙内，改为民办公助，并更名为新建小学。新建小学设初小四个班，有教员四人，校长一人。校长名李英春。原为西南联大学生，由区政府文教科委派来校。新建小学借用大悲阁、关帝殿、弥勒殿为教室，殿内残存的佛像佛龕均未动。1950年后，由于入学儿童增多，教室内需增添课桌、椅，故经有关部门批准及住持僧同意，相继将佛像拆移。新建小学于1950年11月1日改为市立小学，作为夕照寺小学分校仍占用拈花禅寺殿宇上课。1951年4月与夕照寺小学分离，独立成为拈花寺小学，遂把拈花禅寺的殿宇、厢房、院落全部占用。1978年拈花寺小学翻盖新校舍，将拈花禅寺原殿宇、厢房全部拆除，代之兴建两幢教学楼，至此拈花禅寺的旧貌全然无存，拈花寺小学现也更名叫板厂小学。自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石文桂建大悲阁至1978年被拆除，拈花禅寺存在了二百七十余年。

拈花寺的最后一位住持僧海照，他解放后住持拈花寺的功绩可说有二：一是自1949年起，陆续献出殿宇供办学用，并将御书楼及其所在的院落，附近的一些土地供华北防空司令部电台使用，这给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空防保卫首都提供了一定条件；二是对寺内残存佛像、文物、法器的保管尽了力量。1950年3月，海照呈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宗教寺庙管理部门批准，移交了拈花存的房屋和土地，并移交出保存的木佛像五尊、泥塑佛像五尊、大藏经一部（有缺损）画像十九件、清代康熙御书石刻石十五块、以及铁鼎一口、铁点一面、铁磬两个、铁香炉一个、铁蜡钎、木花瓶、铜五供等物。（下接7页）

记著名老旦演员李多奎

延 昌

李多奎原名李万选，字子清，河北省河间县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李宝珍，排行第五，由于身体较矮，人送绰号“矮人李五”，在梆子班任鼓师。李多奎四岁那年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李多奎八岁进庆寿和班学艺，原名李多魁，拜贾志臣为师，工老生。同科有名丑贾多才，旦角艾多芬，丑角王多寿。李多奎由于嗓音圆润洪亮，九岁即登台演唱。十一岁时便演唱主要角色。每场戏可挣八十吊铜钱，赴戏园时优待乘坐骡新车。据名武生高盛麟回忆，他童年曾在李多奎演唱的老生戏《朱砂痣》中饰小孩。李唱了四年老生，在十四岁时由于青年换嗓子（倒呛）不能演唱，从此拜庆福庭老先生改习胡琴，二十五岁时已能操琴为业。这时李之长兄李万和（艺名葫芦红）工梆子老生，嗓音高亢，为梆子班主要演员。家中生计依靠父兄维持。

二

对京剧演员来说，童年换嗓子是一道关。倒呛后的家复，一方面靠自己坚持不懈地锻炼，一方面有赖于多方面的克制和保养。

李多奎改习胡琴后，没有放弃调嗓子练唱，他期待有一天东山再起。在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总是每日天不亮就去天桥四面钟喊嗓子，可称得上风雨无阻。那时候天桥地方不象现在这样繁华，而四面钟又是个空旷地方，周围很少人家，是个艺人们喊嗓子练功的好地方。

一天，大哥李万和陪他去四面钟喊嗓子，刚刚走到天桥路口，遇见一个值夜勤的警察，对他俩进行盘问。警察掏出怀表叫他俩看，面刚夜里两点半！弄得哥俩面面相觑，无言答对。这时警察又发现李先生身后挂着一个硬梆梆的长布袋，赶紧检查。哥俩忙把布口袋打开，却原来是一把胡琴，弄得警察啼笑皆非，便斥责道：“再这么早出来，就把你们抓起来。”他俩唯唯连声，只好回家。从此，每天早晨总是仔细地看准了时钟才出门。尽管这样，冬天最迟不晚于五点，夏天不超过四点钟准出家门。经过十年的严冬酷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练出了一条“铁嗓子”。

李多奎每天早晨喊嗓子回来，他父亲还要用胡琴给他调嗓子。专门叫他唱难度大，腔调高的段子。一次唱《辕门斩子》六郎见宗保那段，有一句“这笑哇，笑坏众英雄！”这个“哇”字是个嘎调，要从中音“3”一下子翻到“i”，骤然翻高五个音节。一般人在倒呛时期，最怕唱嘎调。李多奎正在倒呛时期，唱到此处是干张嘴不出音。当时父亲照着

他脸上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完还让他接着唱。从这次起，每天都吊这段唱。由于父命难违，迫使他在唱唱调时搜索出一个窍门，这就是：一唱到这里就把底气兜足，先用“虚音”来找这个“i”字的调门儿，等够上调门儿后，再逐渐把音量扩大，果然不久就达到这i字的调门。就这样找到了唱嘎调的方法。十年刻苦锻炼，李多奎的嗓音逐渐恢复。一次吊嗓子练功时，有个前靠老师发现他唱音中带有老旦的嗓音，认为他极有老旦的天才，从此他就拜罗福山为师，改学老旦。罗福山与名老旦龚云甫同是“同光十三绝”中郎兰田的高足。李多奎与龚云甫乃咫尺之邻，故而经常教于郎，往来甚密，深得郎氏真传。

三

李多奎改习老旦后，除经常向著名老旦龚云甫虚心请教外，并请龚之琴师陆彦廷为其操琴。陆彦廷为长春班主办人陆华云之弟，陆华云原名景云，行四，工小生，人称陆四；陆彦廷行五，人称陆五，有“老旦琴师第一名手”之称。陆彦廷为李操琴伴得后，便将郎派佳腔全部传授给李，相得益彰。李采龚派之长，又根据自己条件有所发展。他的唱腔挺拔，大有奔腾江水一泻千里之势；从而形成了李派唱腔的特色。

李多奎在一九二一年正式改唱老旦，搭班演出数年后，一次在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出《钓金龟》，由于嗓音洪亮清脆，出场引子就得得了个满堂好，退场下来，好声不绝。这次演出后，深受到内行们的重视。一九二六年，上得大舞台来京遛角，对李极为瞩目。李时年二十八岁，应邀后由中和戏院经理梁化庭陪同去沪演出，与金少山合作《打龙袍》，堪称珠联璧合，二人每唱一句都是掌声雷动，受到观众热烈赞扬，称为“双绝”。当时戏院得门海报上的李多奎三字加大书写，提高了李的名次地位。第二年李又随梅兰芳赴沪演出，名噪一时。后来琴师陆彦廷去世，改由周文晋教琴，配合亦甚默契。

李成名后与曹艳芬女士结婚，生有二子二女，长子李宗华，为名小生茹富华的高足，工小生，现在山东戏曲学校工作；次子李世麟，从名家王雪涛学画，工丹青。

李多奎曾先后与余叔岩、王又宸、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杨菊芬、章遏云、合少山、裘盛戎等名角同台演出。

李多奎嗓音高亮浑厚，吐字清遒，行腔流畅，喷口有力，并善于运用丹田气和声腔共鸣的技巧，收放承接，顿挫有致，长拖腔起伏委婉，一气呵成。当年多次于大合作戏中与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杨小楼同台演出《龙凤呈祥》，在《别宫》一场，他饰美国太和梅兰芳（饰孙尚香）二人引吭高歌，响彻云霄，博得满堂彩声。他先后与合少山、裘盛戎同台演出的《赤桑镇》、《遇皇后》、《打龙袍》，更是珠联璧合旗鼓相当。他那高昂嘹亮的唱腔，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被誉为“合嗓子”。他还整理上演了一批以唱工见长的老旦剧目，如《钓金龟》、《望儿楼》、《三进士》、《遇皇后》等，另外他还发掘了传统剧目老旦戏《药茶计》，这出老旦戏是头带黑网子的得猴扮像，“法场”一场有大段唱腔和复杂的身段，惟演出场次不多，未被人们注意。李多奎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出风格和艺术流派，为发展老旦唱腔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